

刘宇 郭晓鸣 著
倪宗新 郑天奇

中国乡镇企业：

现实与前景

XIANSHIYUQIANJIAN

• 217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对乡镇企业的发生、发展过程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乡镇企业宏观和微观的理论与实践以及所面临的现实挑战与发展前景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并对乡镇企业的历史地位、管理体制、空间布局、土地占用、与农业和城市工业之间的关系等有较大争议的问题,进行了大胆而深刻的剖析,提出了一些独到的看法和观点,对推动乡镇企业发展和乡镇企业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

前 言

与乡镇企业在中国广袤的农村大地迅速崛起一样，乡镇企业理论及其实践中所出现的问题，也迅速地成为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的人们所共同瞩目的热点。受此影响，我们从80年代中期即开始尝试性地投身于对乡镇企业理论及实践问题的研究，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对乡镇企业进行了初步的研究。随着经济理论界大批有关中国乡镇企业问题研究成果的相继问世及我们研究的逐步深入，尤其是我国乡镇企业发展的周期性起落、波动和曲折的交替出现，说明尽管乡镇企业获得了巨大发展，尽管乡镇企业问题的相关研究成果犹如雨后春笋，然而，在客观上依然存在三个方面亟待深入探讨和解决的突出问题：一是对乡镇企业的总体认识仍然是不统一和不连贯的，特别是在国民经济发展产生波动与曲折时往往出现大的摇摆和混乱，不但研究上缺乏系统性、宏观性和综合性，而且相当一部分对乡镇企业的评价或指责，都是有失公允的；二是乡镇企业的发展，几乎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完全一样，是在没有充分理论准备的前提之下开始的，由于理论准备不足，使得乡镇企业在整个发展演进过程中都较为突出地反映出缺乏系统理论指导的局限；三是无论对乡镇企业的成就或者问题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停留于就事论事的表面层次上，缺乏立足于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高度的更宏观的理论抽象与概括。正因为如此，乡镇企业尽管成就

卓著，但并未真正获得与其经济地位相称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

基于以上的基本认识，我们萌发了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从宏观与微观的结合上，从国民经济全局的战略高度上，较为全面而系统地总结和研究乡镇企业问题的想法。为此，从1988年开始了相应的理论准备及相关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这本书虽然面世了，但就所要达到的目标而言，我们的理论功底决定了是力所不及的。但是，我们毕竟进行了大胆的尝试。这种尝试，将非常有益于我们今后对中国农村经济问题的进一步研究。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刘茂才、周琳、林凌、顾宗彬、刘平斋研究员，林受祐所长、吴嘉伟副所长、侯水平处长和杨成佑副处长的关心和支持，唐洪潜研究员为本书写了序言，在此我们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我们在写作此书的过程中，广泛参考了国内外同行的调查研究成果及其相关的资料，大量引用了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年鉴资料和农业部乡镇企业方面的统计资料。对此，我们在书中已尽可能地作了说明。在这里，谨表示诚挚的谢意，对因篇幅所限未能给予说明的，表示歉意。

本书由刘宇、郭晓鸣、倪宗新、郑天奇合著。其中，第二、四、五、六章由刘宇执笔；第一、八、九、十章由郭晓鸣执笔；第三章由倪宗新执笔；第七章由郑天奇执笔。全书由刘宇、郭晓鸣统纂、修改和定稿。本书的编写，由于时间仓促，理论水平有限，错误疏漏在所难免，欢迎理论界同仁及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作者

1991年6月于成都

序

乡镇企业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情况千差万别的大国异军突起，正以其不可阻挡之势，猛烈地冲击着延续了数千年之久的农村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的封闭堤岸，从根本上改变着中国农村长期形成的、与现代经济严重相悖的自给半自给的思想意识、政治结构、风俗习惯及生产和生活方式。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乡村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开辟出了无限广阔的道路与前景。

中国不能没有乡镇企业——这是一个发自农民内心的、寓意深刻的、朴素而伟大的真理。一方面，它反映了中国农民要求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实现治穷致富，彻底摆脱传统农民形象的强烈愿望；另一方面，深刻揭示出了在中国推进农村工业化的客观必然性及其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巨大意义和重要地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乡镇企业发展的重要意义，一开始便突破了本身的界限，甚至远远地超越了农村的地域范围，并在一定的程度上提供了具有国际意义的历史经验。

从农村方面看，乡镇企业的发展，强有力地促进和推动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全方位、多层次地充实并壮大了农村经济实力，已成为农村经济不可缺少的重要支柱和农民收入增

加的基本来源，对于促进农村社会发展和政治安定，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加快农村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客观进程等，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80年代中国农村经济实力的显著增强及农民收入水平的较大幅度提高，就最基本的方面而言，是由乡镇企业的发展直接推动和促成的。1987年开始出现的农村非农业产值超过农业总产值，标志着中国农村经济结构已经开始了质的变化和跃迁，过去单一的、以农业（种植业）为主的农村经济格局由于乡镇企业的迅速崛起而发生了革命性的深刻变革。

从国民经济全局看：乡镇企业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并决定着中国国民经济总体发展的基本格局和态势，已成为国民经济中举足轻重的一支重要的方面军。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资料表明，1988年，全国乡镇企业职工总数为9545.46万人，分别占到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3.8%和全国劳动力总数的17.6%；乡镇企业总产值为6495.66亿元，分别占到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3.8%和全国社会总产值的24%；乡镇工业产值为4529.38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27.6%；乡镇企业向国家交纳税金310.3亿元，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12.8%；乡镇企业出口创汇额为100多亿美元（1989年数），占到国家出口创汇总额的1/4左右。其中：1990年全国乡镇企业总产值已分别占到全国社会总产值的25%和农村社会总产值的60%。乡镇企业在大幅度地推动国民经济增长、提高国民经济总体效率的同时，极大地改变了国民经济整体结构和经济运转的基本流程，重塑了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和协调发展的经济基础。

从对世界经济贡献的贡献上看：传统的农业和现代化的

工业同时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是绝大多数不发达国家典型的经济结构，打破二元经济格局，是不发达国家进入经济发达阶段不可逾越的必经过程。然而，就总体而言，目前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较为普遍地处于传统的二元经济结构的困扰之中，城乡分割和经济失衡的矛盾十分尖锐。中国乡镇企业在经济体制改革和结构性调整中以惊人的速度持续稳定增长的事实，充分地显示出了它势必成为沟通二元结构的桥梁和从二元经济走向一元经济的必要通道，在世界范围内展示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成功模式，从而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改变二元经济结构可资借鉴和选择的有效途径。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乡镇企业近年来一直是理论界和实际工作者广泛关注和重视的理论热点，并相继产生了一大批相关的研究成果，对推动我国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但不能不看到，在这今为止对乡镇企业所进行的理论研究中，还比较突出地存在三个方面的不足。一是系统性不强。主要偏重于对现实问题的分析研究，既缺乏对乡镇企业历史渊源的深刻剖析，又缺乏对农村工业化的国际性历史发展趋势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没有形成完善、系统的乡镇企业经济学理论体系。二是宏观性不强。绝大多数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乡镇企业发展演进过程中所出现的众多微观或局部问题上，未能立足于农村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和国民经济全局的高度，对乡镇企业进行更加宏观的、总体性的研究。三是综合性不强。从经济因素的角度进行分析和研究的较多，而将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等经济和非经济因素结合起来，进行全面的和更深层次的综合研究相对

不足。除此之外，乡镇企业的崛起，不但受到了人们的普遍关注，而且引起了理论界的激烈争论。这些争论不仅涉及到乡镇企业与城市工业的关系、乡镇企业的发展规模与速度、乡镇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乡镇企业发展与环境污染和土地占用、乡镇企业发展与不正之风、乡镇企业管理体制等实践中所遇到的各种具体问题，而且还涉及到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的理论、运行的理论和发展的理论等一系列重大的经济理论问题。这些，也无疑促使人们去反思、去探索、去研究，进而丰富、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乡镇企业是在落后的中国农村广袤的土地上诞生的，同城市的企业相比，历史地注定了必然带有程度不同的落后性痕迹。乡镇企业突发式的飞速发展，给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之间及其农村经济的内部，都带来了一些新的情况、新的问题和新的矛盾。一方面，由于初期阶段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政府未能对乡镇企业的身份加以合法认定，导致理论界尤其是实际工作部门对发展乡镇企业的重大意义和作用方面认识的不断反复。甚至国家的一些部门在进行国民经济综合平衡过程中，往往不自觉地视乡镇企业为“异己”力量，以致于每一次国民经济的重大调整和紧缩，乡镇企业都无例外地被列为首当其冲的重点对象。从一定的意义上讲，这是乡镇企业发展时起时落、频繁波动现象交替出现的根源所在。由于认识方面不应有的偏差和宏观指导及法律规范不力，又由于乡镇企业客观上的落后性和初始发展阶段的自发性，导致了一些企业浪费资源、乱征乱占和滥用土地、污染环境、布局分散、产权不清、管理体制不健全等现象的存在。另一方面，由于不同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社会

经济基础，导致了我国乡镇企业发展水平在不同区域间巨大差异的客观存在。由于起步不同，农村普遍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各地乡镇企业发展的差距，已显示出了进一步拉开的迹象。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所形成的乡镇企业的不同发展格局，产生不同的加速度已经不可避免。如果不从总揽全局的高度进行必要的政策和空间布局的重新调整，建立起全国一盘棋的经济新秩序，乡镇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势必导致区域差距和贫富悬殊的进一步拉大。

《中国乡镇企业：现实与前景》这本书，正是作者为弥补乡镇企业理论研究和实际发展过程中客观存在的这些不足及其问题的尝试。在内容上，该书分为四个基本的层次：一是乡镇企业的发生、发展过程及其在国民经济中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第一、二章）；二是乡镇企业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第三、四、五、六章）；三是乡镇企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几个基本关系（第七、八、九章）；四是乡镇企业所面临的现实挑战和发展前景（第十章）。但各层次内容又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融合、相互交叉、互相完善和互为补充的，从而构成了一个较为完善的乡镇企业的理论体系。在研究方法上，本书既重视了纵向的历史分析，又重视了横向的现实对比；既重视了宏观的理论研究，又重视了微观的实证分析；既重视了经济因素的深入剖析，又重视了非经济因素的系统考察。与已有的乡镇企业理论研究成果相比较，该书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作者既不是对已有乡镇企业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的简单概括、归纳和综合，又没有人云亦云地论述乡镇企业。本书对乡镇企业的历史地位、管理体制、空间布局、土地占用，乡镇企业与农

业和城市工业之间的关系等等存在较大争议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具有较强的系统性、理论性、探索性和可操作性等特征。应该说，是现有乡镇企业论著中起点较高、角度较新、有一定深度的重要研究成果之一。它的正式出版，不仅对我国乡镇企业理论研究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乡镇企业经济学理论体系，而且对于推进乡镇企业持续、稳定、协调和健康发展，也将产生十分有益的影响。

当然，按照辩证唯物论的观点，事物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乡镇企业及其相关联的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与改革，正处于不断发展和进一步的深化之中，人们的认识也势必随着乡镇企业的不断发展而逐步深化。正因为如此，作者的有些认识也必然存在某些不全面、不成熟和不完善的地方。有待于广大读者的批评和指正，也需要作者在今后的进一步研究中不断深化、修正和完善。尽管如此，作为一家之言，作者广泛和深入的探索精神是非常有价值的，在研究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理论勇气和对乡镇企业的巨大热情，尤其是难能可贵的。同时，书中的某些观点，可能不尽为人们所赞同，但从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角度看问题，也是完全允许的。我相信，这本书不论是决策机关、决策者、乡镇企业的厂长经理及其他经营管理人员，还是科研单位的研究人员，大专院校师生及其他有志于乡镇企业研究和关心乡镇企业的人们，都可以从中找到其所需要的东西。

唐洪麟

1991年6月于成都

（序言作者系四川社会科学院秘书长

中国农经学会副理事长 研究员）

目 录

第一章 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	(1)
一、传统体制下的中国农村.....	(1)
二、突如其来的农村工业化浪潮.....	(10)
三、利益调整：乡镇企业高速增长的主动因.....	(17)
四、乡镇企业经济结构的演变.....	(21)
第二章 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	(29)
一、强盛的生命力.....	(29)
二、农村繁荣的决定力量.....	(35)
三、国民经济成长中的巨大贡献.....	(43)
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	(52)
第三章 发展要素的组合与配置	(61)
一、资源利用与资源约束.....	(61)
二、乡镇企业与劳动力转移.....	(67)
三、资金要素：来源与效率.....	(72)
四、发展要素的市场化.....	(79)
第四章 产权关系的现实分析	(85)
一、社区依附特征及其成因.....	(85)
二、所有权分割与缺位的积弊.....	(94)
三、制度创新：产权明晰化的现实选择	(100)
第五章 突破管理体制困境	(108)
一、管理体制：一个尚待解决的难题	(108)

二、行业管理是灵丹妙药吗	(116)
三、宏观管理：健全和强化调控机制	(123)
四、微观管理：完善与再造激发机制	(130)
第六章 空间布局：问题与调整抉择	(139)
一、“遍地开花”现象透视	(139)
二、乡镇企业布局中的土地占用	(145)
三、空间布局调整的选择	(152)
第七章 乡镇企业与农业发展	(161)
一、农业相对萎缩的根本原因	(161)
二、强有力的支持效应	(164)
三、农村：乡镇企业的重要依托	(167)
四、建立有效的利益平衡机制	(170)
第八章 乡镇企业与国家工业化	(174)
一、工业化：经济发展的基本主题	(174)
二、中国传统工业化的非典型特征	(181)
三、拓展新的工业化道路	(187)
四、实现协调发展的战略选择	(196)
第九章 乡镇企业与农村城市化	(201)
一、世界城市化的演进轨迹	(201)
二、失重的中国城市化	(205)
三、新动力：乡镇企业的“造城”效应	(209)
四、“乡镇企业——小城镇”道路的未来 走向	(219)
第十章 现实挑战与发展展望	(224)
一、具有国际意义的创新模式	(224)
二、现实挑战及其根源	(229)

三、走出困境的选择	(238)
四、中国乡镇企业发展趋势展望	(245)

第一章 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

以家庭联产承包制为主线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其异乎寻常的巨大能量一举结束了中国农业长达30多年的停滞徘徊历史。以改革为主要动力，农民长期压抑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农业生产实现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度增长。尽管客观上存在着种种不足和缺陷，但主要由家庭承包制的广泛推行给中国农业带来的深刻的历史性巨变，是无论如何也抹杀不了的。而且，其举世注目的巨大成就，无疑将作为中国农业发展中极其辉煌的一页而载入共和国的编年史。不仅如此，农村改革强劲的穿透力和影响力，还远远超过了人们常规的预期，在更广阔的领域内能动性地发生作用。进入80年代之后，一场静悄悄的，但其意义和影响决不低于实行家庭承包制的伟大变革又在中国农村大地涌动，并很快形成波澜壮阔的大潮，向自然经济基础和传统经济体制发起了更加猛烈的冲击。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已经成为中国农村经济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基本标志。

一、传统体制下的中国农村

1. 农村经济体制变革前的曲折发展阶段

建国以后，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经历了曲折发展的历史

过程。从1949~1978年，大致可以划分为如下几个发展阶段：

(1) 土地改革时期(1949~1952年)

全国解放以后，首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以消灭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为主要目标的土地改革运动。从1950年6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到1952年底，全国范围的土地改革任务基本完成，通过土地改革，全国约有3亿农民分到了7.5亿亩土地，免除了每年向地主交纳的350亿公斤粮食的地租。^①“耕者有其田”的实现，满足了广大农民千百年来对土地的强烈渴望，顺应了民心，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此期间，党和政府颁布了一系列保护农民利益、鼓励农民扩大再生产的政策措施，并在国家财政状况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保证了农用物质、资金的优先供给，并逐年增加。此后，为了在农村避免出现两级分化，同时为了有利于组织起来兴修水利，抗御自然灾害，进一步发展生产，党和政府又引导并鼓励农民组织起来，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广泛发展了农业生产互助组、农村供销合作社和农村信用合作社。在土地改革和互助合作时期，生产关系的变革适应了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受到了高度重视，农民空前高涨的生产热情有效地转化为了现实生产力，农业生产因此得到令人瞩目的迅速发展，为尽快结束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作出了物质基础方面的重大贡献。1952

①《中国农村40年》第4页，中原农民出版社1989年版。

年与1949年相比，全国粮食总产量由11318万吨增加到16392万吨，增长44.8%；棉花总产量从44.4万吨提高到130.4万吨，增长193.7%；油料总产量从256.4万吨增至419.3万吨，增长63.5%^①。1952年全国农业总产值达到461亿元，比1949年的326亿元增长41.4%^②。

（2）合作化时期（1953~1957年）

经过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我国国民经济基本好转。从1953年开始，我国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化战略开始实施。为了保证工业化快速推进中对主要农副产品的需求，从1953年到1955年，陆续对粮食、棉花、油料实行统购统销制度，对生猪、烤烟、黄麻、糖料、蚕茧、羊毛等数十种农副产品实行派购制度。同时，提出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必须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进而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从初级社到高级社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在这一时期，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制度在稳定物价、保障供给、支持城市工业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合作化的初期发展因把分散的小农有效地组织了起来，较好地发挥了分工协作的优越性，也受到了农民地普遍欢迎。因此，农业生产继续保持了增长势头，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比较稳定，工农之间和城乡之间的关系也比较协调。1957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19505万吨，比1952年的16392万吨增长19%；棉花总产量164万吨，比1952年的130.4万吨增长25.8%；农业总产

①1986年《中国统计年鉴》第180页。

②同上第36页。

值537亿元，比1952年的461亿元增长16.5%^①。但是，由于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的弊端，以及合作化后期普遍存在的急躁冒进、贪大求快、强迫命令等严重失误，也给农业的发展带来了不利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以后的发展阶段中开始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

（3）人民公社化时期（1958～1965年）

1958年，我国进入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的成功虽然为我国国民经济的继续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决策的重大失误却使我们很快走向了另一个极端。1958年5月召开的中央八届二中全会，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确认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已经进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大跃进”时期，制定了7年赶上英国、15年赶上美国的经济发展目标，致使严重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的极“左”思潮蔓延到各个方面。在工业发展上，大办钢铁，以钢为纲，重工业倾斜发展战略进一步强化。“二五”期间，我国重工业投资占基本建设总投资比重为54%，达到建国四十多年来的最高点^②。在农业方面，浮夸风、穷过渡泛滥成灾，为适应高速推进的工业化的需要，以“一大二公”、“政社合一”为基本特征，具有很高组织化程度和资源动员能力的人民公社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在行政力量直接推动下，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声势浩大的运动。从1958年8月至11月，在短短数月之内，全国农村74万多个农业合作社改造成了2.6万多个人民公社，参

^①1986年《中国统计年鉴》第167、第180页。

^②1990年《中国统计年鉴》第166页。